

歷史空間

幾首僧人詩的欣賞

龔敏迪

嵌揉進古典文化中具有影響力的精華要素,是《紅樓夢》的一大絕技,所以有人說它是一個大雜燴。隋唐時僧人王梵志的白話詩的內容,在《紅樓夢》中所佔的比例,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王梵志詩的影響力。甚至胡適在匯集自己特別鍾愛的古代絕句時,還和黃庭堅一樣激賞王梵志《翻著襪》一詩,而把它置之卷首。雖然清朝編撰的《全唐詩》沒有收入王梵志的詩,但不僅佛禪門喜歡用他的詩來「教戒諸學道者」或「開悟愚士昧學之流」。唐代詩僧寒山等人的詩,還直接秉承王梵志衣鉢。而王維、白居易、皎然等人,也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響。王維在《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的註中,還給他的詩起了一個「梵志體」的名稱,顧況還作過多首梵志體五言詩。宋代的陳師道、曹祖等人也喜歡模仿王梵志體詩,范成大的《重九日行營壽之地》詩:「山山隨處可行楸,荷鍾攜壺似醉劉。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三輪世界猶灰劫,四大形骸強首丘。螻蟻鳥鳶何厚薄,臨風拊掌菊花秋。」更是直接搬用了王梵志:「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和「世無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中的語言。《紅樓夢》中的鐵檻寺、饅頭庵,包括賈寶玉自稱「檻外人」,就都是從中而來的。皎然在《詩式》中總結王梵志詩的特色是:「外示驚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心」的「跌宕格」。佛門首先要解決一個「色空」的問題,以放棄世俗生活,來達到專注更重要的精神的修為乃至昇華的目的。《雲溪友議》,記錄的一首王梵志詩:「本是屎尿袋,強將粉脂搽。凡人無所識,喚作一團花。相牽入地獄,此最是冤家。」就是「外示驚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心」,用佛經蔑視肉體之意,誘人即色悟空的代表作。

與王梵志相反,有不少詩僧卻寫過不少豔詩,清人毛先舒《詩辯坻》就說:「六朝釋子多賦豔詞」,其代表人物就是惠休。宋代胡仔《荅溪漁隱叢話》就對另一位詩僧慧洪的豔詩非議道:「忘情絕愛,此輩曩氏之所訓。慧洪身為衲子,詞句有『一枕相思淚』,及『十分春瘦』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炫其言,何無識之甚耶!」有趣的是《齊齋夜話》中記載了擅長寫豔詩的他,告誡黃庭堅一事:「師嘗謂魯直曰:『詩多作無害,豔歌小詞可能罷。』魯直笑曰:『空中語耳!非殺非盜,終不坐此墮惡道。』師曰:『若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逾禮越禁,為罪惡之由。吾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頷之,自是不復作詞曲。」看來僧人的豔詩,雖然難免有讓人非議的內容,但世人並沒有完全理解他們「順緣設方」,宣揚情色空無的目的。所以皎然在《答道素上人別》詩中說:「吾門弟子中,不減惠休名。一性研已遠,五言功更精」;另一個詩僧齊己在《尋陽道中作》詩中,也對南朝的詩僧惠休推崇備至,說:「欲向南朝去,詩僧有惠休。」

《法華文句》有一個對「方便」的解釋:「方者法也,便者用也。」所謂方法,目的是把對方的靈機逗發出來。而所謂「方丈」,則除了管理寺院以外,還得看他有沒有好的方法開悟別人。而一些詩僧,特別是禪宗的詩僧,看到了豔情與禪悟的某些細微相通處,所以他們的豔詩就特別耐人尋味。比如汀



隋唐時僧人王梵志。 網上圖片

州報恩寺法演禪師的小豔詩:「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表現的是一個內心有了充實自信的人,自然就不會內不足而外有餘,去過分地追求那些無用的飾物了。

圓悟克勤參訪過許多著名禪師,後來也投到五祖法演的門下。一天,一位姓陳的原吏部提刑官要辭官返蜀中,特來參訪法演禪師時,想知道「甚麼是祖師西來意?」法演問他:提刑大人,你少年時代可曾讀過一首豔詩?叫做「一段風光畫不成,洞房深處惱情情。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詩中描寫了在洞房中等待夫婿的新嫁娘,故意頻頻使喚貼身丫環,其弦外之意,無非是在向新郎強調自己的存在。在法演禪師看來,這後面兩句,就和祖師西來意頗為相近了。

提刑走後,圓悟克勤問道:師父對說的小豔詩,不知道提刑聽了是否明白?法演的回答是:他只認得聲。於是,圓悟克勤跑出去方丈室外,看見一隻公雞飛上欄杆,正展翅引頸高啼,他明白了:這豈不是「只要檀郎認得聲」的「聲」嘛!於是將自己開悟的心得寫成一詩,呈給師父:「金鴨香爐錦繡帷,笙歌叢裡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香爐裡瑞香正在鋪設着錦繡帷帳的閨房裡瀟灑,主人公在笙歌中沉醉於新婚的喜悅。但箇中的種種滋味,卻是無法向外人言說,也不是局外人能夠體會的,這就不僅僅只是聲了。

悟境的禪悅,正如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能自證自知;新娘頻呼小玉情態,換了不在具體情景中的別人,也是難以體會的。禪門悟道,所悟到的究竟是甚麼真理?甚麼是禪?只能:心心相印,就像體味到情境中各自感情的微妙處一樣,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宋人陳善的《捫虱新話》說:「知梵志翻着襪法,則可以作文」。王梵志的《翻着襪》是這樣說的:「梵志翻着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反穿了布襪,雖然外人看了不光彩,但自己的腳卻是受用了。任何事物,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或者過於看重別人的感受,就很可能只是因為懶惰,而跟在所謂的名人後面隨波逐流,是「只認得聲」,那就不可能真正享受到和對人言說追求到真理和知識所得到的那份喜悅之情。

豆棚閒話

李恩柱

謀利

脫脫的《宋史》中有蔡京傳。不過,這位元朝的都總裁官,毫不客氣地將蔡京打入「奸臣」之列。

稱蔡京為奸臣是否合理,不容易用一句話講清楚。好在本文所關注的焦點是蔡京之貪,而不涉及蔡京之「奸」,可以不顧及及怎樣是奸,奸與環境的關係,等等。

提起蔡京之貪,人們在感情上恨恨不已。確實,一個人,倘貪、奸佔據一方,就已經失卻了道德品格,「人將不人」了,應該受到全國人民的口誅筆伐。蔡氏竟然既奸又貪,豈有不被唾罵之理?然而,我們倘若再追問一句:蔡京貪了多少?人們未必能回答出來。稱嚴嵩貪污受賄,官方有嚴嵩被抄家時的家產名錄,說和坤為巨貪,有一份《查抄和坤家產清單》。可是,我們僅知道蔡京貪,至於貪多少,如何貪的,毫無所知。也就是,只有結論,沒有證據。誰了解證據?是皇帝還是監察部門?天知道!總之平民百姓不清楚。當年陳東指斥蔡京為「六賊」之首,並不是完全因為蔡京貪墨,與國家危殆的形勢大有關係。皇帝將蔡氏貶出京城,也不完全因其貪賄,同時皇帝並未抄其家沒收其財產。

這給鑒別清濁出了一道難題。說到底,牽扯到誰能知情的問題。對一些問題,在當局允許議論的情勢下,老百姓可能議論紛紛,但因不知情,極容易捕風捉影,情感宣洩代替理性分析。這不能怪老百姓缺乏理性。因為信息流向是背向平民的,除了神仙或諜報人員,誰能了解真實證據?只有同僚和帝王比較清楚蔡京的所作所為,可在黨爭激烈的朝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現象極其明顯,宋神宗當朝是一夥大臣,宋哲宗當朝又是一夥大臣,輪到宋徽宗的時候,本想平息黨爭,走不偏不倚之路,特意改元為建中靖國。可是積重難返,經過數十年黨爭的熏染,朝臣或多或少存有黨爭的痕跡,最後,宋徽宗時期的黨爭激烈程度與前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蔡京上下盤桓,徽宗時期最厲害。

如此環境,蔡京便像得水之魚,十分活潑。蔡京是甚麼樣的人呢?《宋史》曰:蔡京「天資兇譎,舞智禦人」。就是說,這個蔡京,聰明能幹,工於心計,善於玩弄權術。

人的品質是重要的,除了戰爭時代曹操之類提出過「唯才是舉」,建立了穩固政權後的帝王,一般把「德才兼備」置於更重要的地位。不過,一個官員最後究竟成為甚麼樣子,和是否「工於心計」不是一對一的關係,起作用的因素很多。一句話,個人品格不是永遠靠得住的。蔡京未登官場之時,定無劣蹟,否則科舉的資格審查這一關也難通過。事實上,做了官以後也是無甚甚麼破綻的,一直到宋神宗去世,蔡京都是一個有能力又稱職的官員。以木蘭港水利工程為例,沒有蔡京的努力,築成也難。雖然《宋史》說:蔡京「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識。」元代林亨的《螺江風物賦》卻讚美此事:「丞相為陂,千頃之神淵躍龍。」一事興起,仁智各見,是正常狀態,關鍵在於老百姓是否獲得了利益。當時蔡京只是錢塘的縣尉,林亨稱「丞相為陂」,大概與後人述某人貧賤時舊事卻呼其顯貴後之名,同一理。

蔡京展現投機取巧、無孔不入的鑽營手段,是宋神宗去世,舊黨還朝以後。此時他已在官場歷練多年,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尤其對北宋王朝的黨爭,不僅適應,而且積極投身其中。他是變法派,不停地整人,也不停被別人整。然而,他為官幾十年,人們不知道他究竟貪污了多少,宋王朝也沒有衡量清濁的標準。當然有考績之類,但那些官員皆為蔡京所選任,能奈何?

於是人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貪墨還是清廉。於是人們至今還在亂猜。於是人們更不知道蔡京何時變得貪賄了。於是人們常覺得蔡京從來不怎麼樣。於是人們慨歎:用人要「德才兼備」。卻對本有德,因疏於監督變成無德現象懶得研究。於是人們常引用的是《鶴林玉露》中的文字:「有士大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廂廚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廂廚中人,何為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廂中縹緲縹緲者也。』」

噫嘻呀!真奢侈得可以。然而,這與貪污畢竟不是一回事。(識貪之二)



奸臣蔡京。 網上圖片

亦有可閱

學者四失

蘇軾是北宋時期的文壇巨匠,有人問他:「普通人也能學到你一樣淵博的知識嗎?」蘇軾答曰:「當然能!我過去讀了好幾遍《漢書》,才真正理解了書中的意思,諸如如論、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財貨等問題,我都是就專門問題悉心研究,幾次過後,才能基本掌握。」從這番對話裡,流露出來的意態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心態。問者有求學之心,卻又有所畏難,認為能夠功成名遂的都是些天資聰穎的人,所以生怕自己費時多而得益小,由是患得患失。蘇軾很明確地告訴他,於讀書治學一途,並無捷徑可走,只有恆以持久,勤以補拙,正確掌握讀書的方法,才有可能有所成就。其實這種想學怕難的心態,並不鮮見。《禮記·學記》曰:「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指出讀書人很容易犯下的四個錯誤:一是為學不求甚解,不能充實應用學到的知識,失之過多;二是知識面狹窄,導致眼界狹窄,失之寡學;三是不勤於思考,理解事物多籠統含糊,失之簡易;四是缺乏刻苦踏實的學習精神,時時倦怠停頓,失之畏難。

此學問四失,哲理深微,可通古今。雖然「四失」有看不同的情境,但只要理清其中的脈絡,就可做到明於去取。明代文學家汪道昆家中的藏書很多,有人到他家裡作客,在書架前徘徊良久,神情顯得非常驚訝,不知道自己要多久才能把這些書讀完。汪道昆說:「不要怕書多,書只是資料的儲備,是為了檢索時方便而已,人生中正能用得上的知識,只須熟讀幾種書也就足夠了。」就是提倡讀書要精於選擇,認為求深求通,比廣求博取,卻食而不化更為有益。

當然,知識太窄也不是行的,如此必然導致思維有局限性,行事迂腐糊塗。如《儒林外史》裡的范進,把畢生的精力都放到了八股學業當中,從年輕一直考到老,只是因為偶然的機會才考取了秀才並隨之中了舉人,而且在做了主考官之後,竟然連蘇軾究竟為何許人都不知道。這就是失之寡學的典型案例。



柳宗元 網上圖片

亦有可閱

學者四失

研究學問,對作品的思想內容、歷史背景、人物情性,都要徹底掌握,如果遇到問題,卻因為思維上的惰性,不加慎思,就容易犯下失之簡易的錯誤。北魏時期,「北地三才」之一的邢子才家裡藏書頗豐,可是他並不像當時的學者那樣,對書籍進行勤誤訂正,反而說「誤書思之,更是一過。認為讀帶有訛字謬誤的書,能夠激發人思考,也是一件很快意的事情。他的妻弟感到奇怪,問他:『一對有錯誤的書進行思考,怎麼可能會有收穫呢?』邢子才答道:『如果思考無法得到結果的話,證明這本書也就沒有再讀的價值了。』邢子才的做法,其實就是通過書中的謬誤,對文章的結構以及文字訓詁進行思索,鍛煉自己依循事理舉一反三的能力,由此融會貫通。」

唐代柳宗元在《與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吾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味淡而難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傲而驕也。抑之欲其卑,揚之欲其高,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意思是說,我寫文章從來不敢輕忽怠慢,怕寫出來的文字輕浮而不實在;也不敢持以漫不經心的態度,怕寫出來的文字鬆散而不緊密;還有我從不在心昏氣濁的狀態下寫文章,怕寫出來的文字意義晦澀,模糊而自大。我總是盡量將深奧的道理樸素到文章中,令文字直探本源,同時看起來又簡潔流暢,淺顯易懂。這些為文之法,對我宣揚為學做人的道理,都有幫助。」

柳宗元倡導的就是「一種認真切實、絕不敷衍的為學精神,不管讀書為文都要務本踏實,不要有畏難心理,不作虛空之事,如此學業方能獲得精進。因此說,學者四失,實有至理,只有明察其弊,並掌握避之的方法,及時糾正過失,才能最大限度地獲益。」